



寻根中华

——被历史遗忘的东夷文化

杨鲁昌◎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玉霞
装帧设计：徐 晴



——被历史遗忘的东夷文化

ISBN 978-7-5034-5565-0



9 787503 455650 >

定价：168.00元



寻根中华

——被历史遗忘的东夷文化

杨鲁昌◎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寻根中华：被历史遗忘的东夷文化 / 杨鲁昌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5034-5565-0

I . ①寻… II . ①杨… III . ①文化史—研究—山东省 IV . ① K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6286 号

责任编辑：徐玉霞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 开

印 张：25.5

字 数：60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68.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前言

曾获得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的我国现代诗人艾青说过：“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儿女为之骄傲与自豪。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中国，虽经历几千年沧桑巨变，但中华文化得以传承与发扬。在传世文献上，中国最早的确切纪年，只有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追溯的年代为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再往前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近三千年“有史可查”。

1986年在我任山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对外宣传、教育处副处长时，组织了“山东省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子女夏令营”，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荷兰、香港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子女，回故里“寻根问祖”、旅游观光。在开营式上，美国纽约山东同乡会会长马文礼先生的女儿马智芳代表发言说：“我生长在异国他乡，我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我是来寻根的。今天回到祖先生活过的地方，我才知道我的根在中国，在山东。”在与营员交谈中，谈及上古神话传说时，他们不解地提出诸多的问题：女娲补天是真是假？天为什么会漏？大羿的弓箭能射到太阳吗？夸父为什那么傻？能追上太阳吗？一个年龄大的营员说：“都是假的。”一句话刺痛了我。几十年来，我每当回想起那渴望的眼睛，那赤诚的拳拳之心，就揪心的疼痛，悠悠五千年，泱泱中华大地，竟然连自己祖先的历史都不清楚，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痛”，一个永不休止的“痛”。

正如岳南先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①中说的：“中国及整个东方世界的神秘，不但一个外国人无法全面了解，即是祖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难以全面了解和诠释。事实上，中国古代纪年，在庙堂和坊间就争论了两千多年，尤其是中国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重要转折的夏、商、周三代年代学的勘定，更是争论不休，难有定论。当年孔子作《春秋》时，就曾战战兢兢地认为没有把握，并产生了‘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的感慨。而更早的夏代和商代，在后世子孙的心中已经很遥远了，遥远得如同朦胧的夜空中隐去的星际，只留下了一片迷惘与混沌。面对这一独特的历史场景，后世有不少极端的疑古派学者，在‘不能全面了解’的同时，干脆放言：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夏、商、西周三代根本不是可信的历史，而只是一种传说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上传下来的史影罢了。’”

时光参差，斗转星移，时光过了二十多年。我退休后，2008年5月1日，由朋友邀请，赴日照市考察合作项目。朋友带领我游览了涛雚镇的天台山。天台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美的环境，激发出我寻根中华文化渊源的激情……

在史前文化中，日照地区属于东夷，也称为海岱地区。山东大学张富祥教授在《东夷文化通考》^②称：“中国大陆东端，地处太平洋西岸中部，以雄伟泰山和苍茫大海为两大自然景观的山东地域及其邻境接壤地带，

自古又称海岱地区。海岱地区的古部族,包括久远的土著族和各时期由其他地区流入而逐渐同化的部族(以及一些由本地区流入其他地区而仍保持本土风俗的部族),古文献一般称之为夷或东夷。”本书所谓的东夷文化,不是单指“东夷部落”文化,而是在东夷地域范围内相关部族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及所创造的文化。

沉淀的是历史,传承的是文化。东夷是个神秘的地方,是我国先民最早繁衍生息的地方之一。我国的史学家、考古学家自二十世纪30年代,就在这块“日升先照”的热土上经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历史的脚印,时代的年轮。199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山东大学考古系和美国耶鲁大学、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等,会同国内的文物、院校专家、学者,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经过十四年的考古发掘,覆盖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通过对丹土遗址、两城镇遗址、东海城遗址、尧王城遗址等的发掘考古,获取了准确的翔实的资料。揭示了海岱地区上自北辛文化,下至汉代时期聚落形态的历史变迁,揭开了被历史遗忘的东夷史前、先秦文明神秘面纱。

一、史前文化的曙光与呐喊

中华民族有两个“别称”:一是“中华儿女”,二是“炎黄子孙”。长期以来,我们听惯了中华民族历史一元论的说法: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始祖是黄帝,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是西北的黄土高原,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中华文明是以中原为中心,然后向四方辐射。这个古史框架是由司马迁在《史记》中建立起来的。从《史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蛛丝马迹:当时的司马迁也并不能畅所欲言,他明知道出生东夷的伏羲要比黄帝历史悠久,但是汉武帝自比黄帝,一定要以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他也只好委屈命笔。

对这种“一元论”的观点,早在清末就遭到了史学界的质疑,诸多的史学家提出,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多元化的,并发出“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的呐喊。

清末历史学家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③称:“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昊之虚在陈,大庭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昊与颛顼之虚皆在鲁、卫,帝喾居亳。惟《史记》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与古帝宅京之处不同。然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阳,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封于梁国之虞县。孟子称舜生卒之地皆在东夷。盖洪水之灾,兖州在其下游,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也。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迁,不出邦畿千里之内。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

“五四运动”以来,老一辈的史学家们对于史前文化的“一元论”予以挑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蒙文通研究员于1927年发愤撰集《古史甄微》^④,洋洋六万言。引入了区系文化的类型学原理。推论传说的“古学”有齐鲁、三晋、荆楚三方的分别。三方学术之不同而逆推上古,自然得出“古民族显有三系之分”的结论。他以地域分布称此三系为“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又以传说的“炎帝”、“黄帝”、“泰帝”(太昊伏羲氏)之名而姑且分称三系为“炎族”、“黄族”、“泰族”。他认为三族渊源不同,泰族祖居东方滨海地区,黄族出于西北,炎族则在南方。三族之中,以风姓的泰族为最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研究员1943年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⑤里,就将古氏部落划分为

苗蛮、华夏、东夷三大民族集团，并指出：东夷部落“居住的地方颇为辽阔，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山东、江苏、安徽以及河南中部以东的广大地区。其中有一支可能在商末周初从江苏、安徽逐渐沿长江西上，到达现在的湖北一带。东夷较早与黄、炎系统的部落融合，成为后来的‘华夏族’；‘古之三苗氏所在，大概不出江苏、安徽的长江流域’，‘祝融氏族本来属于东夷系统，后来迁到南方的苗蛮地区。虽然他们不属于苗蛮集团，但由于其势力强盛，因而成了南方氏族的主要代表。’‘今黄河下游，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地区，为北辛·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起源与发展之区。在神话传说中，这个地区有太昊与少昊两大部落集团。太昊分布偏北，时代也可能早于少昊；少昊分布与太昊集团交错重合而又稍南，时代也晚于太昊。两昊的后裔，一部分为诸夏，大部分为夏、商、周三代的东夷’”。

二、“两城镇遗址”考古发掘显现出“东方曙光”

历史，是指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以及对这些事件行为系统的记录、诠释和研究。在文字没有出现以前，人类用行动书写着历史，以口传记录着历史，以神话传说解释着历史；文字出现以后，人类用行为和文字描绘着远逝的记忆。文字是墨写的，而行为是用生命与鲜血铸成的。

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我国考古学家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东夷这块“日光先照”的热土上，发现了历史的脚步，时代的年轮。

海岱地区的考古发掘起于20世纪的30年代。山东大学方辉教授在《从新发现的几封书信说及两城镇等遗址的发现缘起》^⑥证实：“1934年春，王湘、祁延需在山东沿海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发现了以两城镇所含之遗物最多，遗址的范围最大，复原的陶器最多。1936年夏选择了两城镇，由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带领刘耀（尹达）及祁延需，分别在瓦屋村及大孤堆进行了考古发掘。”

正在考古学家们考古发掘如火如荼的时候，日寇“七七事变”的炮声，迫使对“两城镇遗址”的发掘终止，刘耀先生决定以国家为先，放下了即将完成的发掘工作。他在报告手稿的最后做出了如下的注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

现在敌人的狂暴更加厉害了，国亡家破的悲剧眼看就要在我们的面前排演；同时我们正是一幕悲剧的演员！我们不忍心就这样的让国家亡掉，让故乡的父老化作亡国的奴隶；内在的矛盾一天天加重，真不能够再埋头写下去了！我爱好考古，醉心考古，如果有半点可能也不愿舍弃这样相伴七年的老友！但是，我更爱国家，更爱世代所居住的故乡，我不能够坐视不救！我明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明知道这是一件冒险历危的工作，但是却不能使我有丝毫的恐怖和畏缩！

字字血，声声泪。我们对日照“两城镇遗址”的发现、勘查、挖掘、终止的历史，感慨万千，我们为发现、发掘、保护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考古先辈们的“拳拳赤子之心”所感动，是他们首先揭开了我国上古东夷文化面纱。同时，我们更为我们的祖先所创造的史前文明所自豪。

在这次发掘中，发现了距今4500多年前的珍稀陶器—高柄镂空蛋壳陶杯，无釉而乌黑发亮，胎薄而质地坚硬，其壁最厚不过1毫米，最薄处仅0.2毫米，重仅22克，其制作工艺之精，堪称世界一绝，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被世界考古界誉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的制作”。高柄镂空蛋壳陶杯的出土，使华夏史前文明彰显于世。英版《世界史便览》称：“公元前2800年——公元前2000年两城为亚洲最大的城市。两城龙山文化遗址，面积近百万平方米，1936年由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梁思永、尹达和祁延需首次主持发掘，是山东最大的典型的龙山文化遗址，是鲁东龙山文化类

型的代表。”

三、新中国成立历史研究和考古发掘迎来了春天

新中国的成立，海岱地区的考古发掘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经过考古工作者几十年的艰苦努力，考古发掘获得了重大突破：

1957年在日照莒县城东南10公里发现了“陵阳河遗址”。遗址发现了震惊中外的“大汶口文字”。2006年5月25日被国务院命名为“陵阳河遗址”。

1960年在日照东港区发现了“东海峪遗址”。2006年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3年在日照五莲县城东南处发现了“丹土遗址”，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5年，在日照东港区丝山、竹溪村北山和秦家官庄发现打制石器。经专家鉴定，秦家官庄为旧石器时期的遗址，丝山、竹溪村为中石器时代遗留。

2004年9月在日照市东港区高兴镇发现了“尧王城遗址”，遗址面积之大为世界历史同期最大的城市。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核定为“尧王城遗址”。

2009年11月，在日照东港区涛雒镇天台山顶发现远古时期的“太阳神祭坛遗址”。

另外，1981年在日照比邻的临沂市沂源县发现了“沂源猿人”骨骸，“沂源猿人”为中国海岱地区最早的人类。国务院命名“沂源猿人遗址”。沂源猿人及其动物化石的发现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沂源猿人遗址是人类发源地之一，是山东省最早的古人类，为我国东部北京与长江之间一千余公里的广阔空间填补了古人类的空白。

随着考古发掘的发现和历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同东夷文化的存在和其在中华史前文明的地位及作用。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发现了东夷人“上古祭日”，他指出：“殷人于日之出入均有祭。”考古学家蔡运章先生在《三星堆文化的太阳神崇拜》^⑦中指出：“甲骨文中商王到瑒谷祀日的记载。在甲骨文中，有一片三期卜骨上记有下列一组祭日卜辞：‘焚吉。’是：商王祭日出日落，以焚柴祭日，并以牛为牺牲，此祭大吉。”在日照天台山太阳祭坛上的岩画的右侧，镌刻着四个象形文字正是“王其焚吉”。

1978年，我国历史学家唐兰先生最早提出“大汶口文化”即是“东夷昊族文化”的观点，他认为：大汶口文化及其陶器文字的发现，可以证明它属于古史传说上的少昊时代，大汶口文化分布范围正是文献所载的少昊文化区。他于1978年2月2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⑧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中国经过三千年的奴隶社会，并分成三期，太昊、炎帝、黄帝、少昊是初期，帝颛顼到帝舜是中期，夏商是后期。确定了太昊伏羲氏与大汶口文化的一体关系，那么，其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也就有了更为确凿的参考依据。根据考古界及史学界一般的结论，大汶口文化中期为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过渡及父系氏族社会的确立时期，有关古代文献资料表明，太昊时期应属父系氏族社会的早期阶段，因此，太昊及其族群当由大汶口文化中期或早期的晚阶段，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前一阶段，开始发育并逐步成熟。

社会的进步，不仅考古发掘实现了飞跃，大量的史学研究成果公布，使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与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在《应该怎样研究上古的神话与历史——评〈诸神的起源〉》^⑨中明确指出“大皞、少皞、皋陶、伯益、蚩尤、有虞、高辛诸部”为海岱地区原始部族，他认为：“众所周知，所谓‘三皇五帝’自古一系的伪古史体系，是战国秦汉间人们在大一统历史趋势的影响下，依据主观想象而设计和编造出来的历史蓝图和社会发展模式。实际上，史前中国根本不存在像三代以来那样的以某一地域为中心的统一的民族，自然不会有统一的上帝或天皇之神，也不会有所谓‘全人类的共祖’，因而也不会有关于‘原始一神’的传说，只能有各族团各具特色的有关自然神、图腾神和始祖神之类的神话。”“史前活动于海岱地区的东夷民族，其组成有大皞、少皞、皋陶、伯益、蚩尤、有虞、高辛诸部，其崇拜物也是形形色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吴汝祚在《初探海岱地区古代文明的起源》^⑩中称：“海岱地区是《禹贡》九州岛中的青、兖、徐三个州，也是古代东夷族的主要聚居地。这三个州的面积并不大，但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为东夷族发展其社会经济和文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已发掘的北辛、大汶口、龙山等考古学文化，属于东夷族的遗存，从它们遗留下来的资料分析，其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是相当高的。徐旭生先生对中国古史传说的文献资料研究，把东夷族作为传说时代的三个主要集团之一，是很正确的。”

山东省文物考古所所长张学海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岱地区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的成果，认为东夷地区存在着数十万年的历史遗存，是中华文化发祥地和古文明的中心之一。他在《试论莒地古文化古城古国》^⑪中称：“1936年日照两城镇遗址的发掘，发现龙山文化，1957年发现的莒县陵阳河遗址，实际上是最早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1975年日照东海峪遗址揭示的三叠层，提供了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首例地层依据，证明两者属同一文化谱系。80年代的文物普查，再获一系列重大成果。发现了数十万年前的沂水南洼洞、日照秦家官庄等旧石器早期遗址与地点。10万年以后的沂水湖埠西、莒南烟墩山、日照竹溪北沟、竹丝南沟、丝山、丝山西沟、奎山、虎山和胡林村地点，在沂水、莒县、莒南、日照、临沭等地发现一批2万年到1万年左右的细石器文化遗址与地点，北辛晚期遗址也见于莒县、临沭等地，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则成群或零散地分布于全区的山前平原、河谷地带，说明莒地和鲁东南地区一起，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华古文明的中心之一。”

山东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逢振镐以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东夷文化已扩展到中原地区，为中原文化的缔造者之一。他在《东夷文化史》^⑫中称：“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在整个新石器时代，东夷人的史前文化向周围地区的传播是主流。特别是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的文化自东向西（中原地区）发展是其主流。不仅如此，它还直接参与了中原地区文化发展的缔造工作。”“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载的中原地区‘三皇五帝’氏族部落首领之中，有一部分就是东夷族的首领。例如，著名的部落首领太昊、蚩尤、少昊、虞舜等都是东夷人。他们的时代，大体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而这个时期，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在今河南一带大量发现，可证司马迁所记中原地区所谓‘三皇五帝’这些部落首领之中有东夷首领在内之不误。根据以上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来看，在中原文明的起源问题上，确有东夷人的重大贡献在内，他们是中原（河南）文明的缔造者之一。”

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河北师范大学温玉春教授提出了“史前的黄帝部落也起源于山东地区”的观点。他在《夏氏族起源于山东的考古学证明》^⑬中论证：海岱龙山文化“其分布范围应包括山东全省、江苏省和安徽省的北部，以及河南省的东部地区，与大汶口文化晚期分布范围相似。海岱龙山文化的中心地区，



2009年10月18-19日，由山东大学、日照市人民政府召开的“聚落与环境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中国日照尧王城文化论坛”

最多，而海岱龙山文化中又以鲁东最多；其中代表龙山文化陶器最高水准的蛋壳黑陶高柄杯，在鲁东不仅出现最早，而且数量最多。海岱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鸟首形（鬼脸式）足鼎也是起源于鲁东而向四外传播的。”

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烟台大学副校长江林昌论证了“五帝时代中国文明的中心在东方”。他在《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重心不在中原》^③中称：“我们要特别感谢20世纪历史学家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蒙文通《古史甄微》、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等从古文献角度所作的考辨工作，指出东夷民族在五帝时代的重要地位。我们也要感谢建国后的一些著名考古学家，如苏秉琦、李学勤、严文明、李伯谦、张学海、高广仁、邵望平等先生，他们从地下出土资料研究入手，对东夷民族所创造的古文化进行了深入总结。他们的研究虽然各有侧重，但都以实物资料印证了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等先生的文献研究之可信，从而进一步向世人展示，东夷区域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以上我们以东夷民族所创造的海岱区域文化为例，证明五帝时代中国古文明的重心不在中原而在东方。”

四、中美联合考古队十四年的心血揭开东夷文化神秘的面纱

如果把海岱地区史前文化比作一幅被历史遗忘的历史画卷，那么中美日照地区联合考古队就是打开这幅画卷，并留下浓墨重彩的“巨匠”。凝聚着中美日照地区联合考古队十四年心血的《鲁东南沿海地区系统考古调查报告》^④，与其说是“考古调查报告”，不如说是史前文化的呼唤与呐喊，呼唤着历史的真实，呐喊着向“一元论”的挑战。

报告称：“如果对近30年来中国考古学界热点话题做一选择的话，中国文明的起源大约算得上是长盛不衰的热点之一。在这一研究中，中原地区向来深受学术界重视，其中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二里头文化或其晚期进入文明社会，探讨文明起源应该到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酋邦理论，尤其是著名考古学家华翰维所提出的国家形成总是伴随着多个酋邦的相互竞争这一模式的影响，海内外学术界在对文明起源和复杂社会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上开始强调区域性研究，即通过对特

吴汝祚先生曾指出，它‘不是以泰山为中心的周围一带地区，而是向东移到山东半岛，可能在潍坊一带地区内’。实际这种转移的趋势可能从大汶口文化末期即已开始，如：‘莒县陵阳河和诸城前寨遗址，都发现有原始象形字，这是其他类型遗址中，还没见到的现象。’就目前发掘情况看，在鲁东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不仅规模大，堆积厚，而且分布最为密集。另外，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黑陶，以海岱龙山文化出土数量

定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考古遗址的全面考察，来研究本地区文明起源或社会复杂进程，并形成一种倾向性的认识，即黄河中下游地区大约在公元前 2600 年至公元前 1900 年之间的龙山时代发展成为酋邦社会，在稍后各地区的竞争过程中，以伊洛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至迟在二里头文化晚期出现了最早的国家，伴随着权力的集中，在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时代，广大的中原以外的地区被边缘化，当地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出现了普遍的衰落或崩溃。”

报告认为：“如果对那些所谓‘边缘化’地区的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过程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上述观点无疑会面临挑战。在现阶段，尽管还缺乏对于龙山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区域性政体发展途径多样性的深入考察，但大多数研究者已经指出，社会分层、手工生产专业化（包括精美陶器和玉器手工业）和大型区域中心的出现是在众多的地区政治共同体之内发生的，只是在对于这些地区整体性质的判断上，学者们尚存歧义。不过，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表明，龙山时代各地出现的这些政治实体，其社会性质很可能属于早期国家。”

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和史籍记载，东夷史前文化是以日照地区为中心文化辐射布局，日照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创造了相对独立的史前文化，这个文化延续了数万年，正如李守民先生在《日照文化简史》^⑥中所说：“日照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早在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这片土地上便有人类生存，到了农业获得充分发展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日照地区的古代文明发展更是潮头迭起、奇葩频现。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包括整个山东在内的海岱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经历了后李文化（距今约 8500—7500 年）、北辛文化（距今 7300—6100 年左右）、大汶口文化（距今约 6100—4600 年）、龙山文化（距今约 4600—4000 年左右）和岳石文化（距今 4000—3600 年）等几个大的发展阶段。日照地区属海岱文化区东部，借助独特的自然条件，生活在这片区域上的日照先民在新石器时期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瑰宝，文明发达程度在古代中国独领风骚。包括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在内的莒地古文化异彩纷呈，高度发达，在中华大地璀璨的文明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丽篇章。”

或许这一声声呼唤与呐喊，声音是那样的微弱，或许不为人们重视，但血写的历史终究将大白于天下。辛勤的劳动与汗水终于迎来丰收的季节。

2009 年 10 月 18—19 日，在日照召开的“聚落与环境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中国日照尧王城文化论坛会”，就对东夷文化认识来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山东大学教授栾丰实、方辉，尧王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承海，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教授文德安分别以《尧王城考古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及其意义》、《尧典·帝尧·尧王城》、《从日照尧王城、两城镇等遗址看尧舜时期东方海隅之地的邦国及其文明》、《试谈尧王文化》等为主题做了交流研讨。经过交流与讨论，40 余名历史与考古专家一致认为，尧王城遗址出土的城址、图像文字和青铜冶炼的铜渣，是在山东地区最先步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尧王城遗址一带有都城、邑城（东海峪遗址）等大量分散的聚落，是一个强大的崇拜太阳神的文明古国。大量史料足以佐证：距今 4500 到 4000 多年前的龙山时代，在日照市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分布着几个古老的小国。其中一个小国以现在的尧王城遗址（都城）为中心，周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邑城和聚落。那是一个崇拜太阳的小国，也是一个繁荣富庶的小国。它拥有发达的天文观测手段、高超的制陶工艺、先进的建筑技术和最早的图像文字。日照尧王城及其附近的天台山就是东夷文明的摇篮和神秘的“太阳古国”所在地，是上古时期羲和族人及东夷人祭祀太阳

神的地方，也是世界东方太阳文化发源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在会上发表的《从日照尧王城、两城镇等遗址看尧舜时期东方海隅之地的邦国及其文明》^⑦明确指出：“据此，调查者提出这样以两城镇和尧王城为中心的、有多级部落组成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的可以是一种国家组织，很可能是两个互相竞争并有联合的国家政体。笔者以为这样的认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当时无论是黄河的中游和下游地区，还是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都有作为初始国家的邦国的兴起，日照地区两城镇和尧王城这两都邑，就是东方海隅之地两个邦国文明的集中表现。”

山东大学栾丰实教授在会上发表的《尧王城考古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及其意义》^⑧中称：“尧王城遗址历年来的调查和发掘，获取了一批有价值的资料，使我们有可能对尧王城遗址的性质和价值做进一步的认识。归纳和综合尧王城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探讨和认识其在海岱地区史前考古乃至中国考古史上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仅仅根据调查资料就可以确认，尧王城遗址是这一区域龙山文化聚落群中最大的一处，是本聚落的中心遗址。如果这里的城址最后得到确认，我们就有比较充分的理由认为，它就是尧王城龙山古国的都城遗址。”

山东大学方辉教授在会上论证指出^⑨：“我们在鲁东南沿海地区围绕两个盆地所做的全覆盖式调查，此前已有若干篇阶段性成果，显示出当地与中原地区存在着不同的聚落演变模式。本报告是以前11年调查所获资料，并加入近两年调查所得基础上形成的。13年来对本区1440平方公里所作的区域性系统调查，共发现古代遗址千余处。根据本地区考古学文化演变序列和文化分期，共得到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晚商、西周、东周、秦汉等不同考古学文化时期的聚落分布图。这使我们有可能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揭示出这一地区社会复杂进程和区域人口的几次起伏。调查显示，中国北方地区社会政治的变迁是多线形的，远非先前所认为的单一模式。以大型聚落为中心所发生的社会政治的兴衰和人口起伏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曾不止一次发生，大约到了青铜时代晚期，历史文献中所提到的古国势力才真正控制了这一地区。”

五、史前、先秦文化是一部民族融合的历史，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古文明

徐旭生先生早在1943年《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⑩里，就将古氏族部落划分为苗蛮、华夏、东夷三大民族集团。蒙文通教授于1927年发愤撰集为《古史甄微》^⑪六万言，提出“古民族显有三系之分”，即“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

当代史学界对史前历史有三分之说，即“黄帝代表北狄集团，炎帝代表西夏集团，太昊少昊代表东夷集团”。其实，在西北、西南、东北、东南，还有许多的部族，只是没有文字记载的“称谓”，或者史学家已把它们纳入了上述三分的范围之内。

从史前文化的历史研究来看，这种分属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应该仅存在于史前文化早期，也就是存在于部落的形成和初期发展阶段。其实，中华民族的形成的历史，是一部多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融合、团结、统一是主流，且贯穿于整个史前文化、先秦文化之中。

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考古发掘的发现，越来越多的史籍记载和考古发掘证实了史前、先秦时期，东夷地区不仅仅是东夷部族生息的地方，更重要的它是史前“三大民族集团”相聚、融合的地方，是中华民族成长壮大的地方，也是史前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山东大学栾丰实教授在《大汶口文化》^⑫中称：“随着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

人们越来越清楚认识到,中国史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进程是由多元演进逐步走向一体的。最初,各个地区之间的新石器文化联系不多,基本上呈现各自独立发展的态势。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水平慢慢提高,社会生产在不断发展,人口也逐渐增加,居住在不同区域的人们开始了文化上的接触和联系。到距今7000年-5000年的仰韶时代,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已经极其频繁,这对于促进各地文化的迅速发展和融合,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栾丰实教授认为,大汶口文化阶段,正处在各地新石器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传播日益频繁的时期。在大汶口文化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即受到了来自南、西北三个方面的文化成果传播和影响,与此同时,也不断地把自身的文化成果传播到其他地区和文化之中,有时还伴随着规模不等的人口迁徙,改变甚至代替了当地的原住民文化。概而论之,与大汶口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地区是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北方的燕辽地区和东北南部的辽东半岛地区。

根据史籍记载和考古发掘实际,可以描绘出海岱地区史前文化文明的历史:早在旧石器时期,被称为的帝俊自鲁中沂沐上中游,顺水而下,不到山东日照地区沿海和苏北地区,伏羲部落也由苏北迁徙日照沿海南部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时期或者更早,史籍记载的黄帝部落(一部)、伏羲部落、帝俊部落(一部)、少昊部落及江南诸部落已经在鲁南、苏北、皖北和河南东部地区实现了部落初步的融合。

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时期,由于自然气候条件或人为因素各部族纷纷迁徙东夷地区,少昊部落(一部)、蚩尤部落夸父部落由在莒地相继实现了与帝俊部落初步融合。后蚩尤部落、夸父部落、帝俊部落东进日照“丹土遗址”、“两城镇遗址”地区又与伏羲部落融合,实现了有史籍记载的首次部落的大融合,建立了“联合部落集团”。

由于海岱地区部落的发展与壮大与西部的黄帝部落发生了矛盾,经过“黄帝伐蚩尤”之役,黄帝部落挥师东进,先后打败东夷各部族,实现了海岱沿海地区北部的一统。此时,伏羲辞世女娲为王,女娲与黄帝部落融合,统一了海岱沿海地区。黄帝辞世,女娲又与少昊部落融合,“金木轮番”。此后的颡项、帝尝终于完成了一统大业,“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躡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形成了中华民族基本的骨架,夯实了几千年文明史传承的基础。

继而步入尧、舜、禹“禅让”时代,完成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发展历程。大禹、夏启“废除禅让”,实现了“家天下”,拉开了中国“世袭王朝”的序幕。夏启以后部落之间的矛盾一度激化,夏王朝西迁,此后夏商周时期曾对海岱地区进行了反复的争夺。春秋战国后期,秦统一了中国。

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一个多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虽然也曾有过矛盾、冲突,甚至于战争,但融合、团结、统一是主流,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成长、壮大的脚步。其间的集团、部族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于战争,其实质是历史发展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或者是文明进步的争锋,正是这种斗争与争锋,最终是实现了更大的范围、更深层、更紧密地团结与融合。是生产力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与攀升所需,致使中华民族始终充满了顽强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自强不息的历史,中华民族从部落的形成、发展那一天起就走上了团结、共进的发展道路。几千年的风雨同舟、努力拼搏,也正是中华民族前后传承、前赴后继、源源不息的根本所在,正是这种内在的、传统的、永续的“血浓于水”的传承,使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团结一致、拼搏不止,以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历史文化,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六、史籍中的“神守国”与“社稷守国”

早在20世纪30年代，史学界就清末历史学家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②中“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的观点，展开了一场激烈地辩论。

1933年，台湾大学校长、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发表了《夷夏东西说》^③一文，他认为：“夷与殷显然属于东系，夏与周显然属于西系”“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半，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流。东方界线，则其盛时曾有济水上流，至于商丘，此便是与夷人相争之线”，并提出“自夏初以来‘东西对峙’”的说法。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向奎先生于1937年6月1日发表了《夏民族起于东方考》^④，他通过大量的史册记载证实：《史记·封禅书》（今本《管子·封禅》取此）云：“禹封泰山，禅会稽。”不能谓此太山为“霍山”，则禹不能封于山东而禅于山西；以其他十一家封与禅地望推之，会稽之在山东，无疑也！

杨向奎先生又发表了《历史与神话交融的防风氏》^⑤，他认为：在4000年前，存在着神守国与社稷守国。社稷守即后来的阶级社会国家。而神守国，过去我们只是理论上承认它的存在，自孔子的答问到章太炎先生的意见如今得到肯定。我在60年前曾经叙述过夏代南迁的史实，后来多次说明神、巫、史的发展过程。而神的时代，即神守国的时代，防风国（禹后裔之国）即神守国。

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楚平先生的《防风氏的历史与神话》^⑥一书出版。该书对杨向奎的观点作了具体的阐释和发挥。董先生从《国语·鲁语下》有关防风氏的叙述，证明了古会稽有三处，以山东为最早，辽西会稽和江南会稽皆从山东迁去。春秋晚期，越国（相传其王室为夏禹后裔）兴起，江南的“会稽”独传于后世，禹杀防风氏的地点也盛传在江南会稽。董先生又依据历史文献，并结合实地考察，对防风氏的得名、形象、居地、事迹、遭遇，一一进行了考辨。

在现存的诸多的史籍中，由于时代、地点不同和历史记录者视角不同，难免出现错位。“神守国”与“社稷守国”观点的提出，为辨析历史的渊源确定了一个基本的尺度。

七、关于史料中存在“错位”“差异”“失真”现象

关于史料中存在着大量的错位、差异、失真甚至于偏见，其产生的原因，烟台大学副校长江林昌在《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重心不在中原》^⑦中认为：“在五帝时代，东夷民族在中华民族历史舞台上是一个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主角，确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重心不在中原而在山东。然而，这个历史事实却在中原夏商周王朝政治中心的影响下，在周公、孔子整理六经时的‘夷夏之辨’思想的指导下，被人为地改造了。”“在周公、孔子的‘六经’与司马迁的《史记》里，中国文明史上最早建立王朝的却是中原的夏民族，而夏代之前的虞代则不见了；流传到秦汉以后的文字是夏商周甲骨、金文系统，而东夷古文字却消失了；夏商周三族的都城成了政治文化的中心，而东夷地区最早出现的城市中心却逐渐被废弃乃至消失。出现这种历史错位的时间是在距今4000年左右，其客观原因可能是当时的一场洪水泛滥和海水倒侵自然灾害；政治原因则是中原地区夏商周三代王朝文化上的前后相继，以及周公、孔子等人对三代文化的有意弘扬。”

江林昌教授的观点，确实是造成史前历史“失真”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具体到对史籍记载的考量，史籍中大多数记载应为真实的，造成“错位、差异、失真”的主要原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人为原因。

湖南社会科学院研究院梁昭辉和湖南省委党校《湖湘论坛》副总编任俊华在考证《帝王世纪》记载的炎帝为“连山氏”出处时，发现了其中的奥妙，终于揭开了“造成数千年假象”的根源之一所在。

《连山氏与炎帝考—炎帝、炎族发源考辨之二》^②称：神农氏又曰连山氏，始见于唐人张守节所著的《史记正义》，但《史记正义》明确说明引自《帝王世纪》。《史记正义》说：“《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初都陈，又涉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烈山氏。’因《帝王世纪》原书已佚，宋后所见都是辑本，于是各本不同，乃至互相攻讦。清人钱熙祚选刊《守山阁丛书》，其中《帝王世纪》于炎帝神氏条但云‘本起列山，或称列山氏，一号魁隗，是为农皇……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并于句又作注曰：‘此句依《史记·周本纪正义》，又《五帝纪正义》云：‘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烈山氏。’按：此语与诸书所引前后互异，今不从。’《史记周本纪正义》与《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均系张守节所作，而《五帝本纪》在前，所以说“前后互异”，以此更起后人之疑。

梁昭辉和任俊华的考证，发现了张守节以自己的“史籍”互为印证之嫌是十分可贵的。正是张守节的作为，造成了上古炎帝、少昊、皋陶等记载的错位。其实此“错位”也不一定为张守节的故意所为，也许张守节已经发现了史前对“空桑”、“兗”地望的错位，“混淆之说”为不情愿而为之。

考证史前文化，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是“时间”、“地点”、“人物或部族”的“称谓”问题。由于史记载出于不同的年代，对“时间”、“地点”、“人物或部族”的称谓不同，故而造成了“错位、差异、失真，以致造成后人的误解、误判甚至于错误。易造成“错位”的主要有：

关于地望：“冀”“兗”“陈”“莒”“青”“淮”“尸方”“空桑”“穷桑”“阳城”“城阳”“诸冯”“逐鹿”“坂泉”“营”“寿”“纽”“豫”“虞”“梁”“鹑”“费”“雒”“洛”“曲阜”“莱”“蓬莱”“登”“谷”“谷口”“扶桑”“汤谷”“暘谷”“桑林”“春社”“九州岛”“九囿”“羽”“嵎夷”“亳”“姬”等。

关于水系：“济水”“沛水”“兗水”“浊水”“江河”“西海”“东海”“渭水”“淮水”“姜水”“姬水”“大泽”“洛水”“雒水”“甘水”“甘渊”“汶水”“泗水”“沂河”“沐河”“姬水”“棘水”“羊水”“濮水”等。

关于山脉：“不周”“岱”“泰山”“嵩高”“崇高”“会稽”“列山”“介丘”“钟山”“中皇”“烈山”“天台”“连山”“岐山”“箕山”“刑马山”“羽山”“鹿蹄之山”“石楼山”等。

关于人物或部族：“蚩”“夷”“戎”“狄”“玄冥”“句芒”“木正”“蓐收”“金正”“火正”“玄冥”“水正”“句龙”“后土”“土正”。“伏羲”与“太昊”，“炎帝”与“蚩尤”，“蚩尤”与“昌意”，“夸父”与“玄器”，“帝俊”与“帝喾”，“少昊”与“清”，“共工”与“祝融”，“夏启”与“伯益”，“颛顼”与“蚩尤”，“玄帝”与“颛顼”，“神农”与“蚩尤”等。

其他：“扶桑”“大木”“桑木”“臬”“石屋”“石室”“亥步”“苍牙”“圣木”“机矩”“计宜”“苍渠”“天苞”“地符”等。

研究史前文化，只有通过史籍记载、考古发掘和现存遗址、遗迹的相结合，并将时间、地点、人物（或部族、部落）三方面的问题辨析清楚，才能探究出历史的真实面目。我同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日照地区大汶口、龙山时期主要遗址分布图

副所长王震中在《应该怎样研究上古的神话与历史——评〈诸神的起源〉》^③中倡议的：一是应像王国维等老一辈史学家们那样，注重文献典籍与出土的甲骨、金文、简牍、帛书等不同来源、不同性质、不同类型史料的“互证”。二是应像徐旭生等先生所提倡的那样：将不同时期记录下来的材料，根据其成书年代的早晚划分出不同的等级，注意史料的原始性的等次性；在使用的时候，尽量以早期的史料为立论的基础；当尚无早期的史料而只有晚期的史料时，晚期的史料才应摆在主要的位置上；而当早期的史料与晚期的史料发生矛盾时，没有

特别的理由，不应用晚期否定或代替早期。只有这样，才会取得一些较为可信的研究结论，否则只能是缘木求鱼。

八、从“神话”到“史话”说起

关于对史前“神话”的看法,山东大学张富祥教授在《东夷文化通考》^③中阐述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说:“时至今日,重建中国历史,以古史传说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仍然势在必行。考古是重要的,但不是万能的。因为它所提供的几乎全是静态的物质史料,或说是‘哑巴材料’,所以恰当的诠释有时就显得比这些史料本身更为重要。好比一部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如果展示的尽是人类既往的活动遗迹,而没有引人入胜的解说词,那么长长的画面即使怎样琳琅满目、精彩纷呈,也还是不能给人以生龙活虎的动态历史感。”“神话学与考古学之间的冲突时时存在,化解二者的紧张必不可少。现在的新现象,倒是考古学者一边考古,一边说‘神话’,有时甚至比神话学者更执著地相信神话传说中的历史真实。毕竟‘神话’不神,传说并非是一篇完全的谎账,清除迷雾,显露其合理内核,也会得到相当奇妙而逼真的口碑史料。”“我赞成张富祥教授的观点,神话传说并非‘无水之源,无本之木’,神话不神,传说有源,追溯传世的神话传说应有其历史渊源与时代背景。”

西班牙伟大文学家塞万提斯曾经说过：“历史学家的职责是要确切、真实、不感情用事；无论利诱威胁，无论憎恨爱好，都不能使他们背离真实”。考古发掘不断地发现，史学研究的进展，令人兴奋。特别是中美日照地区联合考古队的发掘成果可以说是重大历史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们将其成果与史籍记载相对照、相印证，或许能再现史前文化真实面目。

本人不是学习历史专业的，仅抱着一腔热情用六年的时光，以考古发掘的资料为基础，梳理史籍的记载与发展脉络，考察历史的遗址、遗迹，探索被历史遗忘的中华民族被尘封历史，或许被人称为“笑话”，甚至于被人嗤之以鼻。但我认为“抛砖方可引玉”，或许我的探索能为我国的史前、先秦文化研究，提供一点点信息与线索。我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但众人合力则能使中华民族这座宏伟的大厦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现发表个人的一点点观点与看法。由于自己水平的有限,论证中肯定有不够严谨之处,甚至有错误和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学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注释:

- ①岳南《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海南出版社《考古中国》海南出版社,2007年5月版。
- ②张富祥《东夷文化通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第1页。
- ③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傅杰编《王国维论学集》,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 ④蒙文通《古史甄微》,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 ⑤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⑥方辉《从新发现的几封书信说及两城镇等遗址的发现缘起》,载栾丰实《两城镇遗址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358页。
- ⑦蔡运章《三星堆文化的太阳神崇拜》,《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2期。
- ⑧唐兰《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光明日报》1978年2月23日。
- ⑨王震中《应该怎样研究上古的神话与历史—评〈诸神的起源〉》,《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 ⑩吴汝祚《初探海岱地区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第13-20页。
- ⑪张学海《试论莒地古文化古城古国》,陕西省《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古都研究(第十六辑)—中国古都学会第十六届年会暨莒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 ⑫逢振镐《东夷文化史》,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370-371页。
- ⑬温玉春《夏氏族起源于山东的考古学证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 ⑭江林昌《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重心不在中原》,《东岳论丛》2007年第2期。
- ⑮中美日照地区联合考古队《主要发现与阐述》,《鲁东南沿海地区系统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 ⑯李守民《日照文化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年版,第17-18页。
- ⑰王震中《从日照尧王城、两城镇等遗址看尧舜时期东方海隅之地的邦国及其文明》,载于《尧王文化》,山东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2009年日照第54号,第28-31页。
- ⑱栾丰实《尧王城考古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及其意义》,载于《尧王文化》,山东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2009年日照第54号,第26-27页。
- ⑲方辉《尧典·帝尧·尧王城》,载于《尧王文化》,山东省内部资料性出版物2009年日照第54号,第23-25页。
- ⑳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㉑栾丰实《大汶口文化》,载于《齐鲁历史文化丛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 ㉒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第12卷,中华书局,1950年版,第451—452页。
- ㉓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全集》第三册,台北,1980年版,823-893页。
- ㉔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半月刊》1937年第7卷第6、7期,第61—79页。